

文苑笔谈

从「浮海一粟」到「沧海一粟」

陶诗秀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是我们熟悉的苏东坡《赤壁赋》中的句子，然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了苏东坡亲笔手书的《赤壁赋》，却揭开了原来苏东坡写的是“浮海之一粟”，而非“沧海之一粟”。“沧海一粟”，这句成语“错”就是一千年。其实，古文名言金句出现各种版本的不胜枚举，不仅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都有“错字”问题，就连李白名句“床前明月光”也被搬出遭后世“写错字”，甚至李白的长诗《将进酒》中，“古来圣贤皆寂寞”被发现更早版本应是“古来圣贤皆死尽”。为什么这些大文豪的金句都会出现“错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这首《静夜思》是许多人背唐诗的第一课，但你可知道，日本小学生背的版本竟然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中国人读的是“明月光”“望明月”，日本小朋友读的却是“看月光”“望山月”。

发现华日版本差异的是一名很有“柯南脑”的中学生。2009年，东京华裔初中生相木将希发现李白的《静夜思》在中日两国略有不同。相木将希出生在中国河北省，2005年移民日本。他在中国出版的《静夜思》和中国语文读本中发现日版的《静夜思》和他在日本出版的《静夜思》不大相同。相木将希并非“读书不求甚解”型的学生。他和班上同学联手进行跨越中日两地的考察，咨询日本出版社和往复写信向中国学者，发现中国的版本是明朝以后改写的，日本的版本则被认为极可能是李白的原文。

一位学者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瀚文民国书库、国学大师古籍库等几大数据库中检索到了收录这首古诗的51种文献。60个版本，其中包括宋代文献6种、元代文献1种、明代文献16种、清代文献21种、民国文献7种、宋代版本2个、元代版本1个、明代版本19个、清代版本27个、民国版本11个。在60个版本中，“看月光”为30个，“明月光”为30个，“望山月”为33个，“望明月”为25个……

中国学者告诉相木将希，日版的《静夜思》和现存最早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一致，越早的版本理应更接近李白原诗，清朝康熙皇帝钦定的《全唐诗》也可采用“看月光”这个版本。现今华文世界通行的版本最早可溯至明朝李攀龙的《唐诗选》，并出现在清乾隆年间蒋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而《唐诗三百首》正是华文世界流行最广的通行版本。

“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的《将进酒》，不管读者是否喜好杯中物，都能朗朗上口。但就在2018年，中国一名网友发现网络上数字化的敦煌残卷，唐人抄本所记载的《将进酒》，内容跟大家耳熟能详的版本同中有异。比如，一般人熟知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唐抄本是“君不见床头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变成“朝如青云暮成雪”。最令人意外的，则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变成“古来圣贤皆死尽”。而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将进酒》，最早版本只能推到明朝，比唐抄本晚了好几个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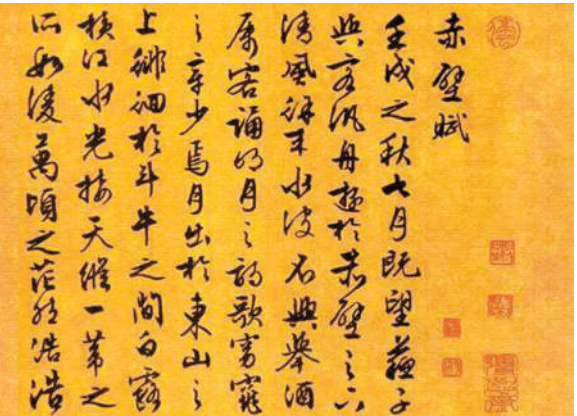
如果将唐版和明版对比优劣，“高堂明镜”跟“床头明镜”无分轩輊，但“青云”比“青丝”更有意境，“云”也可以和句末的“雪”相呼应。而过去讨论“古来圣贤皆寂寞”时，总觉得跟“惟有饮者留其名”合起来有点“尬”，而“古来圣贤皆死尽”的“皆死尽”对上“留其名”就合拍多了。所以，有学者认为，让圣贤“死光光”，比“寂寞”更符合李白的狂傲。这真是脑洞大开的解读！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后赤壁赋》有“苏东坡到底梦到几个道士”的文学公案。最流行的《后赤壁赋》版本，内容为“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飘飏，指苏东坡梦到一名道士。但在故宫所藏的国宝级文物“元赵孟頫书前后赤壁赋”中，却是“梦二道士”——梦到两个道士。赵孟頫所写的这篇《赤壁赋》，曾经在故宫展出。如果赵孟頫写前后《赤壁赋》的版本是参考北宋《苏轼文集》，那他写的《前赤壁赋》用的是“沧海之一粟”而非“浮海之一粟”，却又跟故宫所藏的苏辙《前赤壁赋》真迹不同！那么，到底哪个版本才是“真”？

北宋家“真”，《后赤壁赋》自南宋后几乎都作“梦一道士”，而现藏美国的北宋画家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则清楚画出两名道士，学者推论“二”与“一”的转折点可能在南宋之际，原因未知。至于元代画家赵孟頫为何独作“梦二道士”，有学者推断与元代一统时流传于北方（金朝）的苏轼文集重现中原有关，这一版本可能更接近北宋。明代之后，在不断编纂的过程中或是其他原因下，“梦一道士”成为此赋的通行版本。

报载，故宫文献书画处负责人认为，大文豪如苏轼、欧阳修，填词作赋字斟句酌，会一改再改，可能因此出现不同的版本。故宫所藏“苏轼书《前赤壁赋》”是苏东坡完成《赤壁赋》一年后抄写赠给友人的亲笔手书，只能说苏东坡至少在写完《赤壁赋》的一年后，使用的词汇仍是“浮海之一粟”，但之后大文豪是否改变心意，没有人知道。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浮海”变成“沧海”，是在辗转传抄和出版印刷过程中被误写的。

为什么名诗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版本？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指出，在印刷术尚未普及前，中国的古典文学有所谓的“手抄本文化”，而因抄写者的知识水平和美学标准不同，会出现各种错字、漏字、衍生字，甚至会凭自己的意思改动原文。而即使有像“苏轼书《前赤壁赋》”这样有作者亲笔的“铁证”，也无法确定作者最终采定的版本是什么。不过，读这样的故事不仅妙趣横生，对法律人而言，学到的更有一丝不苟的考据功夫。



赵孟頫书《赤壁赋》

阅评

唐朝制定了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唐律疏议》，其中有大量关于森林、生物、水利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内容。唐朝还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唐诗。唐诗内容丰富、语言优美、广为流传，反映了唐朝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大量吟咏山水、赞美自然的诗歌，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有序利用。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过故人庄》

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老朋友的情谊，和谐地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

隋唐时期人们对森林调节气候、涵养水土的作用认识比较深入，对林木资源的消耗和破坏高度重视，从立法上对泰山、华山等五岳名山进行有效保护。《唐六典·虞部》载：“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唐律疏议》对破坏树木等行为进行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毁伐树木稼穡者，准盗论。”“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对霸占自然界物产的，科杖六十，同时强制退让。对一些特殊区域的盗伐行为，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森林防火的法律责任也有详细规定：“诸于山林兆域内失火者，杖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按照失火的场所、延烧对象、损害后果、时间等因素，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隋唐时期在劝课农桑、推广经济林木种植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唐朝在田令中规定了每户必须种植林木的义务，并由法律明确。《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条载：“依田令：户内业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并规定了不遵守规定的处罚办法，即“课植桑、枣不植，如此事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在《同群公题张处士菜园》中就有“耕地桑柘间，地肥菜常熟”的诗句。由于提倡植树育林，也产生了很多植树专家。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赞赏驼背老人精于植树，称“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

2.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白居易《鸟》

白居易这首诗劝导人们爱惜鸟类，表现了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有人还将此诗加以扩展：“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劝君莫食三春蛙，百千生命在腹中。”白居易的另一首诗《自题小园》还有“池乃为鱼窟，林乃为禽载”之句，也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的爱护。

唐代通过颁布律令诏书建立时禁、断屠等制度，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四年（673年）闰五月丁卯禁作簞捕鱼、营圈取兽者。”《旧唐书·代宗本纪》载，大历九年（774年）唐代宗下诏：“禁畿内渔猎采摘，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式。”这些诏令要求，春夏之交严禁在京城长安周围打猎、捕鱼等。唐代还通过律令对动

书评

面对海水，礁石知道谦卑。面对听众，歌者知道谦卑。面对过去，我们也应知道谦卑。这里的谦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低下头来，审视过往。另一层意思是点燃信仰，潜心向古人学习。古人说：“刚曰读经，柔曰读史。”这不昼昼夜夜，自然是做学问的态度。而这一刚一柔，代表了广度和深度。既指时间的经纬，亦对应作家赵宗彪的《史记里的中国》的斑斓世界。

优秀的史评文字是一根又一根的魔法棒，打破我们对史书的倦怠感。史书相对枯燥，这是我一直以来个人认知。因为，古往今来，风打山山顶。翻开《史记里的中国》，38篇文章，语言依然是熟悉的那个简洁，那个幽默，那个淳朴又亲切的“天台风”。我最喜欢那样直白的表达，这是一种境界，或者说是有段位的人，才可以这样坦荡地描述。文字如袒胸露乳的弥勒，而结论充满哲思。

第二篇的主题，我最喜欢——“做明白人很难”。作者在文章第一段这样说：“认识这个世界，与认识自己，事实上是一回事。自己与世界，是互为镜像。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不过，不认识的更妙，糊涂本身即是聪明人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从幸福上说，做明白人并不合算……”这一段说开去，便是对历史的解读，对君王的解读。说晋国，说魏国，说魏成子和翟璜，也说从王官出来的李吉。继而又拉至时光的另一端，有异曲同工之妙论

莫打枝头鸟 莫食三月鲫

肖爽



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

植物的捕猎时间与工具方法加以明确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载：“诸施机枪、作坑阱者，杖一百……”严禁随意布置“坑阱”，在猛兽出没的山林设置的，要立标识，否则要受到处罚，即对设置机关的场所所有明确要求，避免滥捕及伤人。《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规定更为详尽：“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辨其时禁，凡采捕兽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饕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藉，秋实之登，不得焚燎。”

隋唐时期还有“断屠”制度，即禁止屠宰牲畜和野生动物。最初只是在特定日子“断屠”，《隋书·高祖下》载，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下诏：“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这里的“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是杨坚的父母杨忠和吕氏，杨坚以“断屠”方式纪念自己的父母，这是有史可考最早关于“断屠”的记载。

唐承隋制，“断屠”成为唐代的一项长期制度。《唐会要·断屠》载，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年）正月下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长寿元年（692年）四月，武则天下令：“禁断天下屠杀。”圣历元年（698年）五月至圣历三年（700年）十二月，下令实施长达两年多的断屠。

唐中宗时，断屠制纳入法律规范中，对违禁者实行刑事处罚。《唐会要·断屠》载，景龙二年（708年）九月八日，唐中宗颁发敕令：“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求贖生，敕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县司严加禁断。”即捕捉鸟雀者，杖三十。唐玄宗也力推断屠令。《唐会要·断屠》载，先天二年（713年）六月颁布敕令：“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对于杀死牛马骡等行为，均予以先杖责六十，后科罪处罚，对违犯的官吏，也不允许“官当荫赎”。

唐玄宗还主持编纂《唐月令》。《唐月令》以《礼记·月令》为蓝本，并结合实际作了一些改动，其主要内容是指导农业生产、环境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山水盛唐》

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唐月令》的贯彻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的效果，但之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陷入长期动乱之中，初唐建立的较为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难以续行。

3. 万艘龙舸绿丝间，截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

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共二首，第一首描写成千上万的船舶，在运河两岸的翠柳间穿梭。汴河的开通，使千里余的地面上看不到山峦。第二首讲述有人说隋朝亡国是因为这条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舟楫因此畅通无阻，开通运河的功绩可以与大禹相比。

我国古代很早就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大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由今江苏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并在邗城（今扬州）开凿邗沟。《隋书·炀帝上》载：“（大业）四年（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在隋以前，各水系间已开挖了不少运河，但基本上各不相通，直到隋统一天下，隋炀帝下令开挖了通济渠、永济渠，并将江南运河与邗沟运河相连，南北大运河贯通，全长达2700多公里，构建了以军事和漕运为目的的国家水路运输网络，至今仍然被用于通航。

唐代颁布了专门性的水利法规《水部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单行水利法规，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水权，确立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水权制度，内容及水资源合理使用原则、水利设施、管理机构、航运与灌溉、河渠水量分配等。同时，唐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旧唐书·职官》载，工部下辖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还有负责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的执行机构——都水监，“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凡虞衡之采捕，堰陂池之环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都水监下设舟楫署，“掌公私舟船运漕之事”；设河渠署，“掌修补堤堰陂池之事”。

唐代对水利资源开发利用有明确要求，《唐六典》载：“凡浇田，皆预知顷亩，依次取水，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即在灌溉过程中应根据田地亩数，依次均衡用

司马迁笔下的中国

郑凌红

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史学功底。后两个字，是陈述书的外观状态，比较薄，不算厚。但是“大家”，也代表该书可以被大家认同，有严密且巧妙的内里，让人值得往里仔细瞧瞧。

就像“一个氧气美女，不仅外表美，而且气质，举止不俗，似大家闺秀。限于个人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方向，史书读得甚少，对《史记》也是轻描淡写，倒是早年读过史学家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读的本意是偷懒，想简单便捷地对中国史学有大概的了解，自认为目的性比较强。

风从海上来，风打山山顶。翻开《史记里的中国》，38篇文章，语言依然是熟悉的那个简洁，那个幽默，那个淳朴又亲切的“天台风”。我最喜欢那样直白的表达，这是一种境界，或者说是有段位的人，才可以这样坦荡地描述。文字如袒胸露乳的弥勒，而结论充满哲思。

从从小就知《史记》，知道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在汉朝初年。作为一名宗教学家，官为太史令，兼管祭祀时设坛和读祭文这些迷信的事。可是有一年汉武帝封禅祭泰山，没带上他。他一气而死，把写通史的遗愿留给了儿子。所幸，司马迁见多识广，自20岁就四方出游，思想自然更青出于蓝。他改了阴阳合历，成为绵延至今的——夏历。他用了十年工夫写成《史记》，130篇，分五部分，以一孔之见，其最特别的价值，或许在于司马迁所写的楚汉相争年间的事，和他本人所写的汉武帝时的事。而脉络延展，无巧不成书的是，作家赵宗彪的《史记里

的中国》也花了整十年，依作者所言，前28篇，后10篇，穿梭于历史的丛林中，我想该书的最大意义是“大我”与“小我”的联通，是人性与自我价值的思考。

文学是哲学，文学也是历史学，文学又是心理学，文学更是“人学”。所有的一切，都在于“心是万物的宇宙”。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帝王将相，凡夫俗子，是生命的另一面镜子，也是作者由内而外的“观自在”。我想他或许表达了一种观点——生命应该不舍昼夜，应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他在用一颗文心，雕琢一条“中国龙”。当然，这里的“大闹”，是精神世界的尊严，是对俗常事物的抵抗，也是自我进取的坚韧不拔。他们守规矩，想做事，敢担当，惜光阴，越无常，是励志的化身，也是搏击长空的苍鹰，活出大千世界一个个值得让人肃然起敬的“人”。

读《史记》，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体会。读《史记里的中国》也是这样。不同的角度，获得不同的魅力。作家赵宗彪的“文心”从《史记》中阔步走来，建立了平衡、理性、独特的知识结构，境界类同于“风吹不昏，沙打不迷”，内里乾坤，值得咀嚼，必有波澜。

想起《天工开物》里的一句话：“五行之内，土为万物之母。子之贵者，岂惟五金哉。金与水相守而流，功用谓莫尚焉矣。石得燬而成功，盖愈出而愈奇焉。”这或许是，我眼中的弦外之音。